

TGCR

长江三峡工程
文物保护项目

报告

戊种第六号

峡江地区古代族群 互动与文化变迁

郭立新 夏寒 著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三峡地区自古就成为中国腹地最著名的交通要道以及族群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史前时期长江中游与上游两大文化区在此碰撞，历史时期中原文化与南蛮百濮文化在此交流融合。三苗、巴、蜀、楚、百濮、百越、汉等族群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或影响，各种势力在这一交流通道上东进西渐，此消彼长。秦汉以后三峡地区被纳入国家一体化进程，在感受着中原王朝盛衰变故的同时，富有特色的峡江文化也在不断形成之中。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专家学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峡江地区古代族群互动与文化变迁 / 郭立新, 夏寒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戊种; 6)

ISBN 978-7-03-029296-4

I. ①峡… II. ①郭…②夏… III. ①长江流域—中游河段—民族—研究—古代 IV. ①K2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4464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王光明 / 责任校对: 张 林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A4 (880 × 1230)

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2

印数: 1—1 300 字数: 342 000

定价: 1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

湖北库区编委会

主 任 张 通

副主任 杜建国

编 委 汪元良 沈海宁 杨德菊 吴宏堂

黎朝斌 陈振裕 邢 光 梁今辉

王风竹 包东波 孟华平

总 编 沈海宁

副总编 黎朝斌 王风竹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

戊种（研究报告）第六号

《峡江地区古代族群互动与文化变迁》

项目承担单位

中山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	-----

上篇 先秦族群与文化

第二章 比邻而处：三峡地区史前文化	(7)
-------------------------	-----

第一节 鄂西峡江地区史前文化	(8)
一、城背溪文化	(8)
二、大溪文化	(11)
三、屈家岭文化	(20)
四、石家河文化	(22)
五、白庙文化	(24)
第二节 渝东地区的史前文化	(27)
一、玉溪文化	(28)
二、玉溪坪文化	(30)
三、哨棚嘴文化	(32)
第三节 渝东峡江地区史前文化发展与变迁	(34)

第三章 蜀人东进——三星堆文化在峡江地区的传播	(38)
-------------------------------	------

第一节 巴蜀文化研究史述略	(38)
第二节 文献记载中的古蜀传说	(44)
第三节 考古学所见早期蜀文化	(47)
一、宝墩文化	(48)
二、三星堆文化	(49)
第四节 三星堆文化的东渐及其对峡区的影响	(53)
一、中坝子类型	(54)
二、朝天嘴文化	(56)

第四章 巴人的崛起与西渐	(59)
--------------------	------

第一节 文献记载中的巴人与巴国考	(60)
第二节 考古学所见之早期巴文化	(64)
一、路家河文化	(65)
二、巴文化因盐而兴	(69)
第三节 早期巴文化影响下的十二桥文化	(73)

第五章 楚人西拓与楚文化入峡	(77)
第一节 楚与楚文化述略	(77)
一、楚文化的渊源（新石器时代末期～西周早期）	(77)
二、滥觞时期的楚文化（西周中期～晚期）	(79)
三、茁长期的楚文化（春秋早期～中期）	(80)
四、鼎盛期的楚文化（春秋晚期～战国中期）	(82)
五、滞缓期和转化期的楚文化（战国晚期～西汉初期）	(84)
第二节 楚人西进及其对峡江文化的影响	(85)
一、文献记载中的巴、楚关系	(86)
二、楚文化中的巴文化因素	(88)
三、楚文化西进峡江的进程	(90)
第六章 晚期巴蜀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98)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互动的历史背景	(98)
一、开明氏王蜀	(98)
二、巴人西迁	(99)
第二节 晚期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100)
一、晚期巴蜀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100)
二、晚期巴蜀文化的特征	(107)
下篇 中世纪峡江族群与文化	
第七章 秦汉王朝治乱与峡江地区文化变迁	(119)
第一节 秦文化的西进东渐	(119)
一、四川盆地的秦文化对渝东地区的影响	(119)
二、江汉地区秦文化对三峡地区的影响	(126)
第二节 从墓葬材料看峡江地区融入汉文化的进程	(130)
第三节 秦汉时期峡江地区的居民族属问题	(138)
第八章 唐宋以来峡江地区经济开发和文化变迁	(141)
第一节 考古所见之峡区经济的发展	(141)
一、农业	(141)
二、商业的兴起	(145)
三、集镇和古城	(147)
第二节 从宗教遗迹看峡江佛教文化的变迁	(158)
一、早期佛像和白毫相俑	(158)
二、唐宋寺庙遗址和佛教造像	(160)
第三节 墓葬所见之峡江地区葬俗的变迁	(166)
一、蜀汉至南朝时期的丧葬习俗	(167)

二、隋唐时期的葬俗	(170)
三、宋元时期葬俗	(177)
第九章 峡江地区现今族群格局与文化特色的形成	(181)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	(181)
第二节 美洲作物的传入与山地开发	(184)
第三节 峡江区域文化特色的形成	(187)

第一章 绪 论

长江自重庆到宜昌段的干流习称“下川江”（宜宾到重庆段为上川江），又因穿过著名的三峡而称“峡江”，全长 660 千米。

峡江正好位于中国第二阶地与第三阶地的过渡地带，东连江汉平原，西控四川盆地，北接大巴山和秦岭，南抵武陵山脉与云贵高原北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使峡江地带自古以来成为中国腹地最著名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族群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形成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峡江地区的意义不仅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文化区而存在，更像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舞台、文化传播的通道，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东来西往，在这里上演、谢幕或交融。史前时期长江中游与上游两大文化区在此碰撞，历史时期中原文化与南蛮百濮文化在此交流融合。三苗、巴、蜀、楚、百濮、百越、汉等族群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或影响，各种势力在这一交流通道上东进西渐，此消彼长。自秦汉时期这一地区被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以后，中原王朝的盛衰变故也常常波及这一地区，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产生极大的影响。

峡江地区作为文化交流通道，交流的方向首先是东西向的，即作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上游文化区的交流纽带。

对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而言，三峡犹如咽喉。四川盆地四周均为海拔 1000 ~ 3000 米的高山环绕，大巴山横亘其北，云贵高原陈列于南，西靠青藏高原，东锁于巫山山脉。长江自西部第一阶地横断山脉而下，沿盆地南缘和东缘逶迤而流，最终冲破巫山阻拦而浩荡向东。盆地内部海拔 200 ~ 750 米，由于地形北高南低，盆地主要河流均由北向南流，汇入长江干流。盆地底部按其地形差异，又可分为盆西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三部分。流经盆西平原（成都平原）的岷江和沱江，流经盆地中部丘陵的嘉陵江等皆自北而南纵贯整个盆地，分别在宜宾、泸州和重庆汇入长江。盆东平行岭谷区，由多条近东北西南走向的条状背斜山地与向斜宽谷组成，山地陡而窄，高 700 ~ 1000 米，山岭间的谷地宽而缓，海拔 300 ~ 500 米，其间丘陵、平坝交错分布。与盆西平原和盆中丘陵区不同的是，长江干流直接穿越盆东平行岭谷区，该区支流大多直接汇入长江。在现代交通手段发展以前，河流往往是重要的交通要道，盆地内的城镇和大型聚落大多位于河流交汇处。盆地内的地形以及河流走向，使盆地内的交通系于一江，而长江又受扼于三峡这个狭小的出口。所以，三峡通道对于研究四川盆地与外界交流状况，尤其是在穿越秦岭和大巴山、沟通盆地与关中的古道开通以前的交流与文化传播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两湖文化区而言，峡江地带则又充当着西进腹地的角色。以江汉平原和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其地形远没有四川盆地封闭。通过西北方的南阳盆地，或穿越北部的大别山可以进入中原，或溯汉水西上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往东，则可以顺江而下进入长江下游，亦可南下

进入岭南。在历史上,长江水道或南阳—荆襄古道,一直是中原文化入川的重要交通要道,荆州和宜昌等峡江东口地带则是假道入川的前进基地。西邻的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亦经常成为两湖地区少数民族迁徙的重要去处。

在这种东西向的交流中,渝东峡江地区正好处于中介者位置。盆西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河渠稠密,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经济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即为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盆西平原恰是离峡江最远的区域,这就意味着盆西平原经峡江与其他地方文化中心进行交流时,必须借助渝东峡江的中转。两湖文化入川,首先影响到的也是渝东峡江地区。这使渝东峡江地带文化经常在来源上具有交融性和复杂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过渡性特色。

可以说,在渝东峡江地区,长江干流是东西交流的主通道。沿途重要的节点,自重庆起,由西南向东北流,至万州拐弯,折而向东,至奉节进入巫山山地,依次穿越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进入峡江东口宜昌。因沿长江干流进行东西向交流而引起的文化差异在地域分布上有明显的反映,为便于说明各个时期文化的空间差异,本书将重庆—宜昌段长江干流分为两大段四小段。首先,以瞿塘峡为界,其东为“三峡地区”,其西为“渝东地区”。三峡地区又以巫峡为界分为两小段,分别称为“三峡西段”(主要包括重庆市巫山县)和“三峡东段”(主要包括湖北省巴东县和秭归县)。三峡西段的古代文化遗存大多分布于大宁河宽谷中,三峡东段的遗存则多见于香溪宽谷和庙南宽谷。三峡地区加上清江流域合称为鄂西地区。渝东地区以万州为界,分别称为“渝东东段”和“渝东西段”。此外,宜昌、宜都、江陵等地则称为“三峡东口地区”。本书中所表述的区域所指范围,除有特别说明外,其含义均与上相同。

此外,经清水江沿河而上,经湖北恩施,再经大溪进入长江干流,继续向西直接穿越山岭进入重庆,是另一条大体与长江干流平行的东西向交流通道。三峡的形成,跟江水壅塞于四川盆地而东寻出路有关。在燕山运动中,三峡地区的齐岳山、巫山、黄陵三段山地背斜隆起。因喜马拉雅造山——横断山脉持续隆起,西部古长江向西南流的通路被中断,壅水开始向东寻找出路。江水以数以百万年计的时间,切穿了齐岳山、横石溪、楠木园、黄陵等背斜,分别形成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上下段的以石灰岩为主的90公里大峡谷,形成了大溪、香溪和庙南三段总长约102公里的宽谷。最终使东西古长江经由三峡,实现了贯通。三峡形成以后,由于江面狭窄,两岸山岭陡峭,巫山一带经常因山崩而发生壅江事件。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望帝(杜宇)立(巴人鳖灵)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鳖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壅江导致川江水位急速升高,江水沿从瞿塘峡东口的大溪南流进入清江^①。所以,历史上大溪河和清江是渝东鄂西地区的另一条连接东西方向的重要交流通道。

渝东峡江地区在南北向交流方面的重要性,虽然无法与东西向相提并论,但对于我们理解前述渝东峡江地区文化分布的地域差异性 or 该地区文化分布的空间格局,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峡江地区南北向交通要道大多与汇入长江的支流有关。重庆是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自

^① 赵世龙:《重庆曾在100米水下长江南流造天坑地缝》,《羊城晚报》2006年10月21日。

此溯嘉陵江而北上，至合川一分为三，西纳涪江而东汇渠江，几乎汇集了整个川中丘陵以及川东大部分地域的水系。经涪江和嘉陵江上游可达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所以，合川、重庆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涪陵则是乌江与长江汇合处，沿乌江南进则可深入云贵高原腹地（合川、重庆和涪陵都曾作过战国时期巴国的国都）。忠县谿井河虽然不长，却是长江一级支流。穿行于巫山山脉深处的大宁河发源于大巴山南麓，至巫山汇入长江，这是一条将汉水上游、大巴山区与峡区连接起来的重要的南北向通道。自大宁河与长江汇合处的巫山县城溯江而上，不远即可到达另一条南北向支流——大溪河，前文提到大溪河是沟通长江和清江的重要通道。这样，在巫山境内，大宁河与大溪河一北一南构成了一条与长江干流垂直的南北向通道，将大巴山和巫山，长江与汉水以及清江流域沟通了起来。

渝东峡江地区以万州为界，其西以高山峡谷为主；只有宽谷地带才适合人类生存，古代文化遗存大多发现于宽谷地带。这一区域受地形限制，山多平地少，不适合发展大型集约农业；但由于背山面水，渔猎资源相对丰富，渔猎在很长时期内为当地重要生计来源。万州以西主要为盆东平行岭谷区，具备一定的农业耕作条件，人口较为密集。

渝东峡江地区盐卤资源十分丰富。这一带著名的盐矿或盐泉有大宁河上游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忠县谿井、涂井，奉节白盐碛，云阳云安、故陵长滩盐泉，万县长滩井，开县温汤镇盐泉、彭水郁山盐泉及湖北长阳西的盐水等^①。作为人类生存必需品，丰富的盐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不同族群围绕着盐业资源展开的竞争和冲突，亦为考察渝东峡江地区古代文化的兴衰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由是之故，峡江地区以其作为文化交流通道的性质，而成为考察古代族群互动以及文化变迁的理想之地；近年随着三峡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也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所以，本书的写作目标为对峡江地区的族群和文化变迁做一长时段的重构和解读，特别是在古代族群互动与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峡江地区古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与动力，利用近年来三峡地区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成果，对该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各种考古学文化和考古遗存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关系以及文化交流与融合历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由于本书涉及对象众多，时间跨度大，需要整理的资料非常多，论述时侧重于宏观的文化发展关系的把握而对诸文化发展的细节如分期等较少涉及。

在内容安排上，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先秦族群与文化”主要介绍先秦时期渝东峡江地区的族群与文化变迁，主要涉及蜀、巴和楚等族群及与之相应或有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将主要透过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讨论相应的族群互动与族群关系问题。下篇“中世纪族群与文化”主要透过近年三峡考古新发现，介绍历史时期渝东峡江地区在纳入到国家体系以后所经历的国家化历程以及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地方文化的形成历程。

^① 赵炳清：《略论峡江地区盐卤资源与楚西进置郡的关系》，《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上篇 先秦族群与文化

第二章 比邻而处：三峡地区史前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一些古生物学和古地理学学者认为三峡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发源地之一的非洲大裂谷十分相似，是适宜人类和原始动物栖息之地。据冯小波先生统计，迄今在四川盆地和长江三峡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达60余处^①。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居住在三峡地区的史前人类逐渐增多，他们创造了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考古资料表明，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大约为距今8000~3800年。在发现的80余处遗址中大体以瞿塘峡或巫峡为界，东西两地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系统^②。三峡东部地区与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较为接近，其考古学文化谱系为城背溪文化（年代距今约8000~6700年）—大溪文化（距今6700~50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000~46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200年）。这一区域上述诸文化虽然有一定的地方性特点，但总体上属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是该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阶段的白庙文化时期（距今约4200~3700年），三峡东段的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逐渐减弱，却明显受到来自渝东地区的文化的强烈冲击。

瞿塘峡以西地区，即渝东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过去基本上是空白，近年随着三峡考古工作不断开展，有了重大的突破。丰都玉溪文化的发现，将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推至距今8000~7000年，是目前该地区所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稍后的玉溪坪文化年代相当于大溪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玉溪坪文化已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表明渝东地区的史前文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玉溪坪文化进一步发展为哨棚嘴文化，该文化以忠县哨棚嘴遗址为代表，其时代大体相当于三峡东段的石家河文化与白庙文化。哨棚嘴文化有特征明显的器物群，在渝东地区有广泛的分布，且形成沿长江东进的态势，三峡东段白庙文化的出现，很可能跟该文化的影响有关。

本章将在分别介绍上述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和文化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前述诸文化的关系，以此说明渝东峡江地区史前时代的族群关系与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① 冯小波：《四川盆地及长江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初论》，《2003 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徐光冀：《永不逝落的文明》前言部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第一节 鄂西峡江地区史前文化

学界一般认为,迄今发现的鄂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年代序列为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以及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白庙文化。由于峡江地区迄今未发现彭头山文化相关遗存,故本文不作介绍。

一、城背溪文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掘湖北秭归朝天嘴^①和宜都城背溪遗址^②后,确认这是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一种文化,其命名最初由严文明先生提出^③,响之者众而沿用至今^④。城背溪文化包括湖北境内的城背溪类型和湖南境内的皂市类型。距今约8000~67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近来有一些学者主张将原来划为城背溪文化晚期的遗存独立出来划分为一个新的文化,即柳林溪文化^⑤。考虑到本书的目的及需要,本书仍沿用旧说,即将柳林溪文化从城背溪文化中区分出来进行单独的介绍。

峡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属于城背溪类型。遗址有宜昌窝棚墩^⑥、路家河^⑦、三斗坪^⑧、伍相庙^⑨、杨家嘴^⑩;秭归朝天嘴、柳林溪^⑪、东门头^⑫、玉种地^⑬,巴东店子头^⑭、白羊坪^⑮;宜都城背溪、花庙堤、白水巷、金子山等^⑯。这些遗址均位于三峡东口以及峡区东段的长江两侧一、

①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② 陈振裕等:《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史前研究》1989年辑刊。

③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④ 杨权喜:《试论城背溪文化》,《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⑤ 罗运兵:《试论柳林溪文化》,《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⑥ 杨权喜:《宜昌窝棚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

⑦ 长江三峡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年三峡坝区三斗坪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⑨ 黄文新:《宜昌伍相庙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

⑩ 李天元、祝恒富:《湖北宜昌杨家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

⑪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⑫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东门头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⑬ 宜昌博物馆:《秭归玉种地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⑭ 胡雅丽、武仙竹:《巴东店子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⑮ 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巴东白羊坪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⑯ 罗运兵认为,柳林溪、朝天嘴、杨家湾、龚家大沟、伍相庙、三斗坪、玉种地、白羊坪、大溪、花庙堤、孙家河等遗址含有柳林溪文化即城背溪文化晚期遗存。参见罗运兵:《试论柳林溪文化》,《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二级台地上，在西陵峡内外分布最为密集。

城背溪文化时期已出现水稻栽培，在秭归柳林溪等地发现的陶片中，含有作为掺和料的稻谷壳。长江中下游地区是野生稻的生长区域，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栽培稻的地区^①。一些学者根据考古新证据而认为该地区是稻作农业的发祥地。城背溪文化水稻遗存的发现，说明当时峡江地区的人们已经懂得利用水稻作物。但是，由于峡江地区受自然环境限制，缺乏大面积的平整的土地和有效的灌溉方式，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稻米只是一种不重要的辅助食物。

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城背溪文化的先民们的食物来源是渔猎和采集。此时峡区的先民们大都依山临水而居，周围有茂密的森林和草地，又有江河湖泊，非常适于渔猎和采集。在城背溪文化遗址中，经常出土大量打制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网坠和石球等，大多为渔猎工具。同时遗址中还出土大量兽骨、鱼骨。以城背溪遗址为例，该遗址出土了很多动物骨骼，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牛骨、鹿骨、鹿角和鱼骨，另外还有鳖的背甲和蚌壳等。在巴东店子头遗址，考古人员采集到大量经切割、敲打而呈破碎状的动物骨骼，物种数量多，说明当时野生动物种群繁多，人们以狩猎和捕捞以及采集获取肉类和植物性食物。

峡江地区城背溪文化时期，长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滩上有大量的砾石，石料的来源相当丰富，因此城背溪文化的先民们使用的石质生产工具较为丰富，器类有斧、锛、球、网坠以及石片、石条和盘状器。这些石器大都为打制石器，其中石斧较为常见，石斧的形状、大小、厚薄均不甚规范，以长扁弧刃形较多见。石器一般从沙滩砾石敲打出石片，然后加工而成。制作粗糙，显得较为原始。除了少数石器经过第二步加工，在刃部略加磨制，其他部位仅稍微打磨或未经打磨，一面保留砾石的自然面，另一面两侧和顶部多有打制的凹形裂痕。

城背溪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制陶的技术，不过当时制作的陶器还比较原始，但无论是制作、胎质、火候还是器形、纹饰，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陶器烧制的火候不高，陶质疏松，容易破碎，许多陶器呈乌黑色，器表常见黑烟斑块，这是烧制时燃料贴近器壁的痕迹。其次，陶器均为手制，用泥片贴筑法成形。泥片贴筑法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制陶方法。贴接时，根据所需器形及器物的不同部位，将陶泥捏压成不同形状的泥片，例如圈形、梯形、圆形和条形等。然后互相叠接捏成粗型，再在粗型内外贴补抹泥，使胎壁牢固，表面平整。因而此法制作的陶器器壁厚薄不一，表面不平整。有的陶器底部、颈部、口部往往特别厚，不少器物口沿另贴一圈泥条。器外壁从口沿唇部开始，一直到底部中间，都有深而乱的粗绳纹，这种绳纹主要不是装饰，而是制作痕迹。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其次是弦纹，另外还有锥刺纹、压印纹、刻划纹、镂孔纹等，亦有少量彩陶。锥刺纹、刻划纹多见于罐的颈部、圈足盘的足部和支座上，镂孔主要见于圈足盘的足部。

^① 迄今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早于城背溪文化的稻作遗存主要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万年），通过土样中的植硅石分析，发现早期地层有采集的野生稻，晚期出现栽培稻。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稻谷4枚（年代约为距今1.2万年），经鉴定兼有野、粳、梗稻综合特征，为演化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4枚稻谷是迄今世上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实体。在湖南澧县，距今约9000~8000年的彭头山文化的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均发现有炭化稻谷、稻壳和稻米。